



# 任天才：“硬骨头汉子，了不起的共产党员”

任天才（1919年—1947年），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西永固村（平罗县原任家夹道）人，出身贫苦，共产党员。28岁，任天才便走完了一生。然而，他却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承诺。

1919年，任天才出生于平罗县原任家夹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父母相继离世，大哥出外谋生再无音信，二哥逃亡到了外地，家中仅有的两间房也被地主霸占了。13岁的任天才和12岁的弟弟任天佑无家可归，只好靠给姓李的地主放羊糊口度日。苛刻吝啬的地主不是克扣兄弟俩的工钱，就是不给饭吃。无奈，兄弟俩只好去给大户董家放羊。

贫苦的家境和备受压迫的苦难经历，使任天才自幼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痛恨“吃人”的旧社会，一心向往过上好日子。1938年7月，土匪抽兵。地主董良壁家被抽兵一人。恶毒的地主心疼自己的儿子，便买通了保甲长“偷梁换柱”：趁任天才放羊时在西山口把他抓住交给了土匪，顶替自己的儿子去当兵。三年间，任天才历尽苦楚，暗下决心，一定要逃离这个魔窟。机会终于来了。

1941年6月，麦收时节。任天才所在部队回家在平罗的士兵放假半月，让他们回去割麦子。临走时，连长恶狠狠地威胁部队班长李英选：“走多少，回来多少，少一个就枪毙你！”

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逃脱机会，任天才冒着风险暗和李英选商议出逃计划：“听说共产党是为咱穷苦人谋解放的，咱找共产党去！”两人一拍即合，一路摆脱了匪兵的监视，躲过了国民党骑兵团的重重封锁，在牧民刘安子的帮助下，到鄂托克旗落了脚。两人隐姓埋名，一边给地主干活，一边暗中寻找党组织。最终，在革命同志邵文章的帮助下，两人在定边找到了回民支队负责人王茜、王延等人，在边区参加了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组织派遣任天才重回鄂托克旗，以做短工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一方面争取更多的穷苦百姓和国民党逃兵到边区来扩充我党力量；另一方面打探搜集敌方军事情报。这段时间，任天才经受了重重考验，迅速成长起来。1945年夏，经王延绍，任天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工作热情更高了。他千方百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长年出没于敌占区，收集了不少有关国民党二十六师和傅作义部队的情况。

1947年3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马鸿逵集中了几个团的兵力进犯三边地区。根据统一部署，部队实行战略撤退，任天才临危受命，被组织安排潜伏下来，继续坚持地下工作。而此时，国民党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肆搜捕党员和积极分子，恐怖气息弥漫各地。就在3月中旬的一天，任天才去大庙（布拉格）一带搜集情报时被国民党盯上。傍晚时分，他刚一回到居住地便被早已埋伏在此的蒙古骑兵抓住。为了从任天才的嘴里获得党组织的情报，敌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皮鞭抽、木板打、磨盘拽，甚至用竹签钉手指、用脑箍勒头、用铁烙胸背……各种残忍手段把任天才折磨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任天才始终紧咬牙关，没有暴露身份，严守组织机密。他暗中向组织交代遗言：“虽然我的身体被打烂了，但骨头架子还在。请组织放心，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二十天的肉体折磨下来，敌人什么也没能得到，他们失望了，便给任天才扣上了“宁夏逃兵”的帽子送

到了盐池的马匪手中，关押在位于银川的“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狱中，任天才被马匪团长余正超（任天才原在他手下当兵）告发，敌人这才获悉任天才“共产党员”的身份。

1947年10月的一天，原惠农县黄渠桥镇上一派肃杀景象，马匪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将任天才押赴到一个沙堆上。自被捕至今，半年来任天才受尽折磨早已形销骨立，但站在刑场上，他却竭力挺直脊梁，大义凛然。看着悲切哭泣的四弟任天佑，他说：“我是为了咱穷人过上好光阴才遭到敌人迫害的。我死后，你不要难过，用张席子卷回去就行了。”临了，他还留下暗语嘱咐四弟到鄂托克旗参加革命。就这样，年仅28岁的任天才被杀害。

1953年2月6日，宁夏民政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为任天才颁发了烈士证书，将烈士遗骨迁移到大武口武当庙山下。每逢清明节，各族人民到烈士陵园扫墓，缅怀任天才烈士的英雄事迹。

（据宁夏党史教育网、石嘴山党建网）

##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10万大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挥师东指，挺进宁夏，宁夏解放指日可待。但时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仍然执迷不悟，命令其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重新调整了各军建制，设置了三道防线，妄图负隅顽抗。针对敌人的防御部署，解放军决定首先突破第一道防线，截击宁中—贺兰军，争取驻扎中卫的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然后再集中力量歼灭金积、灵武、银川之敌。

9月1日，十九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宁，全军将士奋勇杀敌，至17日，占领了沙坡头、迎水桥一带，兵临中卫城下，敌八十一军处于解放军大军包围夹击之下。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及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马鸿逵、马惇靖父子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决心率部起义。

18日，马惇靖派马培清为代表，到宁中宁与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联络部长牛连壁和谈，并拟定了协议条款，定于19日中午12时签字。19日上午，马惇靖乘羊皮筏子来到康渡渡口对面黄河中心的一个沙滩上，解放军六十四军派副政委傅崇碧到沙滩上去见马惇靖，邀请马惇靖到岸上来谈判。马惇靖与傅崇碧一同乘羊皮筏子到黄河南岸，又共同乘汽车赴县城富宁公司中宁办事处（军部所在地）。

在军部，解放军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和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同马惇靖正式谈判，郑维山和曾思玉两位军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具体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约法八章》的详细内容，告诉马惇靖应当走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马惇靖表示接受《约法八章》的各项条件，通电和平起义。下午7时，曾思玉代表解放军十九兵团，马惇靖代表国民党八十一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八十一军宣布起义。宁中、中卫两地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解放。21日，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船渡过黄河。

至此，宁夏解放曙光重现，前景一片光明。（据《宁夏党史故事》）

## 盐池：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可“羽翼陕北，控扼朔方”，有“平固门户”“环曲襟喉”之称。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饶彦久认为抗战时期，盐池县的作用很重要，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是抗日和反摩擦的前哨阵地，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对外窗口，为抗战胜利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研究宁夏的抗战，不能忽略盐池。

### 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 盐池上空飘起豪迈的打盐歌

1941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饶彦久说：“蒋介石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调集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军队分驻边区周围各县，对陕甘宁边区重重封锁，动用了50万的兵力对付这个‘弹丸之地’，在边区周边各县设立盘查哨站实行连环保堵，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统区的货物，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信器材等运往边区，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想把边区活活困死。”

这个时候，毛泽东发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盐池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尤其是生产食盐。食盐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多种工业、药品的原料。

1941年秋，八路军120师359旅四支队千余人，奉命到盐池县的花马池打盐自救，历时一年有余。八路军战士为了不打扰群众，他们在古城墙上挖建了100多简陋的土窑洞住宿，他们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每天都要唱三支歌曲。第一支是《起床歌》：黑夜过去天拂晓，红日东升人起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飞起大步向前跑。第二支是《开饭歌》：这些饭菜人民给，我们应为民出力，救国救民靠吾辈，赶走东洋日本鬼。第三支是《打盐歌》：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我们的天地同胞，岂容小日寇欺。生产前线，参加打盐队。嘿！参加打盐队。这些歌曲雄壮豪迈，催人奋进！

1941年，四支队打滩盐5万驮（每驮150斤）；1942年，打井盐50万驮，滩盐35万驮；1943年，打滩盐3万驮。1942年冬，四支队在盐池打盐的事迹受到党中央的表扬，359旅旅长王震亲自到盐池慰问部队。1943年春，打盐部队奉命到南泥湾开荒。八路军359旅四支队在盐池打盐，使食盐产量猛增，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和巩固发展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食盐不仅满足了延安和军民的食盐需要，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运往周边的国统区，换回粮食、布匹、钢铁、药品、器械等物资，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延安《解放日报》4年时间报道盐池251次，其中48篇都与盐池的盐有关。”饶彦久对这一细节记忆犹新。

### 当时的盐池县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川区的广大人民

盐池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无私奉献，把生产出来的粮食、皮毛、肉、食盐等物资送往前线，支援抗战。每年秋收后，盐池县人民都把粮食打净晒干，早交粮、交好粮，赶上毛驴，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把粮草送往国库和前线。

虽然当时老百姓都很困难，但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都很踊跃。抗战期间，盐池县人民一提前超额完成救国公债和救国公粮。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盐池县曾掀起过四五次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先后有上千名盐池儿女走上了抗日前线，许多人在与日寇的战斗中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有些人还成了无名英雄，虽然牺牲了，但在烈士名单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1940年以前，中共宁夏工委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通过盐池县境进入国统区，遇有情况变化，也通过盐池县境撤回边区。从宁夏送往边区的进步青年，也都首先经过盐池县境。盐池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来往的联络站、转送站，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抗战时期，盐池县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干部廉洁奉公，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劳动人民的乐园和外界了解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窗口。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化成风、人民苦不堪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时的盐池县，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宁夏川区的广大人民。川区人民不堪忍受马鸿逵集团暗无天日的压迫剥削，“人人都往东山里跑”。饶彦久说这是盐池在那个时期的特殊魅力。

（据抗日战争纪念馆网）

# “宁夏战役计划”因何搁置？

“宁夏战役计划”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唯一一次以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直接援助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唯一一次以寻求军事援助为目的的军事行动。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认为，这一计划“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一“主要一环”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

## “宁夏战役计划”的形成和被迫搁置

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先后到达甘南，与西征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将形成互为犄角、互相策应的有利战略格局之时，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适时制定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计划在征询三个方面军意见后，于8月25日报告共产国际。9月7日，共产国际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中国问题，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的计划草案。

9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致电三军领导人，阐明中央打通苏联的方针，并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进行重点部署。

至此，遵义会议之后，经过中共中央多次酝酿、逐步成熟的“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终于以宁夏战役计划的方式得以确定并准备实施。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使实施宁夏战役、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实施的时机也基本成熟，宁夏战役有了提前实现的前提和可能。

面对红军三军会师局面，蒋介石制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张学良不愿打内战，立刻向中共通报了“通渭会战”的情报，表示将尽量拖延，并建议迅速执行宁夏战役；敌情的发展使中央开始考虑“提早攻宁问题”；苏联方面也希望红军尽早实施占领宁夏的方针。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正式发布了夺取宁夏的具体战略部署——《十月份作战纲领》。为了统一宁夏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央书记处决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由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而《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至此，宁夏战役计划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抢渡黄河成功，标志宁夏战役正式实施。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渡过了黄河，并控制了一条山、五佛寺等战略要地，打开了北进宁夏的门户。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按照中央的部署多次设伏歼敌，但均未成功。而敌人却控制了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搁置。

## “宁夏战役计划”搁置的外部因素

宁夏战役准备和开始实施之际，正是日本企图吞并内蒙古地区，策划进攻绥远的时候。对于绥远的局势，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1936年，中共中央先后派人前往晋绥，向阎锡山、傅作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0月15日，毛泽东又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在察晋绥三省形势危急万分之一时，“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红军之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10月25日，毛泽东再派雪枫送信给傅作义，阐释了红军抗日报国的决心。10月26日，毛泽东和红军将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46人致书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表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先驱”。

正如毛泽东向国民党方面和晋绥当局所真诚表白的那样，中共中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实现红军参与对日作战。但中共方面的抗日诚意并没有被国民党和晋绥当局接受；相反，晋绥当局反倒担心绥远守军会陷入前有日伪、后有红军夹击的困局。在傅作义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如果红军继续强攻宁夏，就有在全国各界热情支持的抗日部队背后发动进攻的嫌疑，这在政治上对中共极为不利。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有了暂缓实施宁夏战役的想法。为了使绥远的傅作义部消除后顾之忧，毛泽东在10月26日给傅作义的信中郑重声明：“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阵地开进。”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委婉地表达出要推迟宁夏战役。

苏联方面对绥远危急早有了解，判断日本西进的意图是造成对苏联包围的态势。鉴于红军北攻宁夏不但可以扩大苏区，壮大军事力量，而且还可以给西进的日本人以某种威慑，遏止日军西进。因此，在日本西侵绥远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选定被日本方面看中的定远营作为援助中央的地点。但为了避免苏联

和内蒙古直接卷入对日冲突，共产国际也对援助的有关事项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是援助的武器数量有限，而且没有红军所希望的重炮和飞机；二是委托一家外国公司以贸易的方式分两次运送到外蒙古边境的指定地点，苏联和外蒙不承担护送货物的责任；三是要求红军派遣足够数量的部队到边境接收货物。

然而，绥远形势的急剧变化超出了苏联的预料，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改变援助地点：“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共产国际对改变援助地点的解释有三点：在严寒和沙漠的环境下，派数千中国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可能；最关键的是第三条，苏联方面担心“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取得援助是“宁夏战役计划”制定和实施的主要目标和前提条件，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成为导致“宁夏战役计划”搁置的直接原因。

## “宁夏战役计划”被迫搁置的内在原因

主力不得不从打拉池地区向东转移。红军河东主力与渡河部队的联系被敌人隔断。

对于张国焘不积极配合而导致“宁夏战役计划”搁置的责任，中共中央在1936年10月29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即有明确的结论：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彭德怀自述》中记述：“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李先念在《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也说：“张国焘……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在红军被敌军和黄河天堑分割开的形势下，军委曾有让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单独完成宁夏战役的考虑。虽然红四方面军是一支长期独立战斗而且也善于独立作战的英雄部队。但在得不到主力红军的配合和协助的条件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认为单独攻

宁困难很大。考虑到各种因素，中央军委放弃了渡河部队单独攻宁的想法，准备了3个多月的“宁夏战役计划”不得不被迫中止。

“宁夏战役计划”制定和实施不仅照顾到当时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而且也充分考虑到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但对于实施这一重要军事行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军委的估计和准备仍显不足。

关于中央对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的失误，毛泽东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

（据银川党史网）